

辛亥革命史

论文集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
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

96
K25-7.07
10
2

辛亥革命史论文集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
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C 203328

粤新登字01号

辛亥革命史论文集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 编
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肇庆市狮岗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125印张 240,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218-00905-0/K·204

定价：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1991年9月27—28日，广东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会议以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辛亥革命与广东为主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探讨。提交会议的论文、资料共64篇，现从中选出16篇结集出版，并将陈锡祺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与广东》编入。

本书编辑组成员为：丁身尊、邱捷、李时岳、沈茂骏、林家有、莫世祥、黄彦，李时岳为组长，邱捷任编务。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将推动广东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本书编辑组

1991年12月7日

目 录

辛亥革命与广东·····	陈锡祺 (1)
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张 磊 (8)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化进程·····	李时岳 (38)
辛亥革命彻底革了封建帝制的命·····	方志钦 (51)
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	林家有 (67)
辛亥时期国内学堂风潮述论·····	桑 兵 (88)
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	刘圣宜 (119)
论民初国会覆亡引起的反省和探索·····	莫世祥 (138)
论黄兴与两湖革命·····	袁立春 (156)
广东地区辛亥革命运动三题·····	丁身尊 (189)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新 流 木 子 (209)
帝国主义对广东辛亥革命的干涉·····	黄菊艳 (222)
广东军政府裁编民军新论·····	周兴樑 (232)
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军政府的	
清乡·····	邱 捷 (259)
试论民国初期广州的近代工业·····	杨瑞贞 (297)
许雪湫生平事迹考·····	赵春晨 (315)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苏 苑 (329)

辛亥革命与广东

陈锡祺

十年前，我们广东同行曾在越秀宾馆举行过一次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在住医院，临时被拖来主持开幕式。我记得孙儒同志致开幕词，香港王德昭先生、武汉章开沅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会。一晃十年过去了，孙儒同志、王德昭先生都已经过世，追念当日情景，很是感慨！

今天，我们为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广东同行又一次共聚一堂共同研讨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问题。当然，这次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参加，说明了新生力量不断成长，后来居上已是必然规律，这是广东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十年来，我们大家虽有机会在其他一些讨论会上聚会，但像这一次由全部广东同行参加而又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确是少有的机会。这次会议破除了以往一些会议的繁文缛节，集中时间和精力讨论大家都感兴趣的学术问题。听负责筹办会务的同志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60多人，提交的论文就有40多篇，在近年的学术会议中，这算是比较高的比例了。我们这个会议，拟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辛亥革命与广东”等中心议题，我感到非常好。这次会议，时间虽短，但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开得很成功。

我因身体不好，脑力衰退，已经难于写出论文。在这里，只想就“辛亥革命与广东”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和感想，以就教于各位，希望有些意见能引起各位研究和讨论的兴趣。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各个民族、各个省区都程度不同地为这场革命作出了贡献。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广东在这场革命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部辛亥革命史，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写起，有关广东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且是很重要的章节。

我认为，广东与辛亥革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孙中山，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生于广东，长于广东。广东在近代中国有着反侵略和反封建压迫的传统，他的革命思想主要就是在广东酝酿和发展起来的。孙中山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地点虽然是在国外的檀香山，但兴中会的基础则在国内，尤其是在广东。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数是广东人。1895年春，孙中山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策划当年10月在广州起义。孙中山本人也回到广东内地活动。这次起义虽未及爆发即告失败，但推翻清廷、创建共和的革命却从此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广东发端的。

第二，辛亥革命运动不仅是在广东发端的，而且从1895年到1911年，也就是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都特别重视经营广东。孙中山全面考察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广东是最适宜于首先举行起义的地点。现在看来，按革命党人当时拥有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只能选择便于集结兵力和接济饷械的两广

举行起义。孙中山以广东为发难的地点，并不是不重视全国的革命，他只是希望首先在革命条件比较成熟的广东取得胜利，然后把革命引向全国。孙中山的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例如黄兴、赵声都在广东活动过。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谈到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他亲自领导的10次起义，其中8次起义的地点是在广东。在武昌起义前，广东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次数最多的省份，也就是说，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在很长的时间内，广东是主要的战场。兴中会、同盟会在广东发动的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尤其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即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孙中山后来称这次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见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革命党人在广东的奋斗是分不开的。由于革命党人在广东长期活动，所以较广泛地得到广东群众的支持。武昌起义后，广东终于在1911年11月9日宣布独立。广东的军政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旧官僚和原来的保皇派在广东军政府里面毫无地位，而且难于进行有影响的政治活动，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几乎是没有的。

广东军政府不仅在财政上支持南京临时政府，而且派出一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北伐军，这支军队在捍卫新生的民国立下了很大功劳。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对广东的建设仍十分重视，曾经想依靠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在广东实行平均地权，希望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民国初年在广东执政的革命党人，尽管有不少缺点，但在他们执政期间（1912年到1913年），广东确

实出现了一些民主革命的新气象。所以说，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广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三，广东在辛亥革命中又是群众革命情绪特别高涨的省份。在各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广东各阶层的群众参加。港、澳地区的各界群众，也给予辛亥革命以很大的支持。海外广大华侨，尤其是广东籍的华侨，可说是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主要的财政支柱。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各地民军蜂起，一下子就形成了十几万人的队伍。尽管这些队伍成份复杂，但在促成广东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方面，民军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组成了十几万人的民军队伍，这是革命党人长期在广东活动的结果，也是广东人民革命情绪高涨的表现。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财政上都得到广东人民的支持，共和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广东也得到比较充分的承认。1912年5、6月间的“国民捐”运动，广东各界的捐款相当踊跃，表现了很大的爱国激情。可惜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弱点，未能充分调动蕴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革命积极性，后来竟越来越远离群众，革命的失败，这也是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广东人民的革命热情给予很高的评价。1918年5月在《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中说：“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孙中山还着重肯定了从1895年以后20多年间，广东人民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及为捍卫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功绩。孙中山的话，正是对广东人民所作出的贡献的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第四，广东又是受辛亥革命影响特别深的一个省份。辛亥革命虽然最终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这场革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

源地和武装斗争的中心地区，所受的影响就更大了。在这里，我只举出一点：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从1917年起先后3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捍卫民主共和，后来又在广东召开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的高潮。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广东一直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前线和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区。而辛亥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特别重要。有人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我有同感。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几年，广东一直是中国革命民主派反对军阀统治斗争的基地，这与广东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既然广东在辛亥革命中有如此重要地位，那么，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就自不待言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据我所知，国内外学者确有不少是注意研究这个题目的。就我们广东来说，40多年来，广东学术界在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方面是有成绩的。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收辑资料，写回忆录，出版专辑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广东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多年来，也做了很多工作。中华书局的《孙中山全集》大部分是由我们广东学者编辑的。广东学者所撰写的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论著，不仅有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有不少具有相当高的质量。例如张磊同志的《孙中山论》，就是一部受到国内外同行很高评价的专著。广东学术界在与港、澳、台学者以及与国外学者交流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限于时间，恕我不多讲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以已经取得的成绩为满足。在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孙中山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据我所知，不少同志已经完成或正在撰写这方面的著作。与广东辛亥革命有关的人物、事件，我们过去作

了不少研究，但难免还有不足甚至空白的地方。在这里，我只举出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冯自由，他是广东南海人，十几岁参加了兴中会，在同盟会时期又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在1905年冬发表在《中国日报》上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是同盟会最早系统宣传民生主义的文章。但学术界对于这个人物，似乎还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在辛亥革命的史料学方面，冯自由更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开国史》等，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时征引率很高的史料书。大家都知道这些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也知道其中有不少错漏，甚至是有意的曲笔。对冯自由这些书，我们似乎还没有作过系统细致的考证，有时似乎约定俗成地引用了，结果不免以讹传讹。过去我们不研究冯自由，可能因为他是反共老右派，孙中山当面斥责过他。1981年夏天我在北京见到冯乃超同志，他说冯自由是他的叔父，抗战期间，党曾要求乃超同志做冯自由的工作。说明这个人是值得研究的。像冯自由那样经历复杂而又在辛亥革命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广东还有不少，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对辛亥革命在广东的进程，辛亥革命中广东的人物、事件研究得比较多，但对辛亥革命前后广东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薄弱。我们至今还没有像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整理出版一批辛亥革命前后的经济史料。广东在明清经济研究方面成绩很突出，但在清末民初经济研究方面，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就有较大的差距。恐怕这是应该认真规划，组织人力去搞好的。在这里，我要申明一下，因为身体关系，近年很少去图书馆、资料室，去了也是走马看花，学术信息，很不灵通。我刚才提到的问题，也许早有同志在研究甚至已出了成

果，我的讲话无非是希望广东的同行，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而已。我们广东史学界素有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辛亥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一定会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果。

（本文系作者在广东省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

——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张 磊

在观察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产生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越是在时间上远离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却能更为深切地、全面地和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评估它的实质和意义。

流光如驶，辛亥革命距今已经80年。发生在本世纪初期的这场社会变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业已清晰地显示出来。研究工作的深化和拓展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从本质上看来，则是由于围绕着这桩事件的激情终于平复，理性的反思占据了绝对优势。

毫无疑义，辛亥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它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对于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更替，它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以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超越了先前的进步社会思潮和运动，结束了民主革命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准备阶段，使之入于正规；同时，它又成为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先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后来的斗争提供了积极的因素。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它的政治和思想的启蒙意义更是不容忽视。

辛亥革命，是年青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两个世纪交接的时刻所演出的一出悲壮史剧。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民主精神，使它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丰碑，青史永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先驱者的业绩，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奋斗，庶几无愧于逝者和来者。

一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正规的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它为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和政纲所指导，从而，得以摒除了先前的进步社会思潮和运动——主要是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许多盲目性和局限性。这种理论和政纲，集中体现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制订和倡导的三民主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由封建末世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贫困而又落后。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枷锁，为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拯救和发展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都必须承担这项历史的使命，所有真正的社会变革则要以之为其主要内涵。围绕着亟待解决的课题，民主革命的承担者分别作出了答案。农民阶级提出了素朴的战斗纲领，进行了多次起义和战争。资产阶级维新派传播了社会变革方案，并作出了付诸实践的尝试。这些运动带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变革的性质，产生过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又由于答案缺乏完满性，致使它们的结果未能跨越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而作为民主革命承担者中卓越的政治和思想代表，孙中山和他领导的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提出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第一个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纲领。与先驱者的理论与方案相比较，三民主义完满回答了历史的课题，自觉地顺应了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把民主革命推到更高阶段。毋庸置疑，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主流。

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主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具有首要的性质；同时，多民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不同的民族矛盾，又是越来越纠结在一起：外国侵略者把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者当作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者则把外国侵略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而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

农民阶级曾为解除民族压迫而斗争。从太平天国呼吁“同心协力扫荡胡尘”到义和团号召“灭洋”，就是他们反对双重民族压迫的素朴纲领。农民阶级的斗争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和统治者，但历史的局限——表现为纲领中的笼统排外倾向和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因素——毕竟妨碍他们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动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而日益勃兴，维新运动具有强烈的救亡色彩。他们竭力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并促使爱国者确认社会变革的必要。康有为认为“中国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也”^①。谭嗣同更以越南、香港还“殷鉴”而疾呼“自强”^②。

① 康有为：《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记》第1卷。

② 《谭嗣同全集》，第101页。

为了挽救民族危难，他们诉诸社会变革：“变法而强，守旧而亡。”^①“君子们”的激越呼声推动了救亡和变革的社会运动的发展。但他们未能了解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政策，不无偏颇地把民族危机归咎于中国的“不自振”和“日即于乱亡”^②，在客观上淡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至于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以为“治标者，即联英日之谓”^③，则无异于与虎谋皮，实际上妨害了御侮图存的主张。在对待国内民族问题上，维新派大都对以满洲贵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政策采取回避妥协的态度，抹煞国内民族矛盾的存在，倡导“满汉合作”，认为无须“种族革命”，以皈依于他们的保守主义。维新派唤起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并把爱国与社会变革密切相联，但在对待帝国主义和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态度上，则是对农民阶级以暴力抗争的悖反。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们倡导的民族主义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族主义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的“民族思想”，而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民族主义也承接了维新派将民族独立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的观点，却又抛弃了妥协——主要是“满汉合作”口号——的倾向。当然，民族主义更多地“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

“反满”，显然是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兴中会的誓词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宗旨。同盟会又在宣言中重申

① 康有为：《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记》第1卷。

② 康有为：《第五次上皇帝书》，《戊戌变法记》第1卷。

③ 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第4卷，第25页。

了推翻“满洲政府”的任务。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许多著述中反复阐述了“反满”的内涵，矛头主要指向满洲贵族。这是合乎逻辑的现象：一方面，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始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另一方面，它日益成为侵略者在华殖民掠夺的社会支柱。因为它以自身的腐败为侵略者欺凌中国提供了可能性，更在后来充当了列强的奴隶总管。民族主义不能缺少“反满”的主旨。这个口号曾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

挣破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独立，无疑是民族主义的又一基本内容。尽管这个课题未被置于首位，但它仍是民族主义的主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时刻踏上历史舞台的，他们的活动具有浓郁的救亡色彩。兴中会的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面临着“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威胁，因此，这个团体的任务就是“集会众而兴中”和“莫我中夏”^①。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孙中山进一步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认为“天下列强高唱帝国主义”，而“亚洲土地几尽为白种吞并”^②。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更为明确地断言：“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乃是民族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的原因^③。至于如何挽救危亡，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共识是“非先倒满洲政府”即“非革命无以救垂亡”。他们也像维新派那样片面地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归咎于“政府不振作”和“人民不奋发”，但却从这里引申出了“反满”的重要论断。

在这个历史阶段，“五族共和”大体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

② 《国父全书》，第39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1页。